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宋文选

四川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宋 文 选

上

四川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宋 文 选
下

四川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宋文选 (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2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frac{1}{8}$ 插页 4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0,000

书号 10019·4981 定价 1.85元

前 言

宋代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的繁荣肇端于宋初的新古文运动。这场运动，远继先秦、两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适应自己时代的需要，从理论和创作的结合上，推动散文成为反映现实、进行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从而奠定了我国近古散文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唐古文运动在进行积极的思想论争和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历晚唐、五代，散文创作又衰落下去。这原因是多方面的。较为直接和明显的是：一方面，从古文运动本身看，强调载孔孟之道和“务去陈言”、“词必己出”，针对六代以来的浮华、庸滥，固有其必要性，但这些口号本身有它内在的局限，因而一经推衍，就露出弊端。韩愈之后，李翱和皇甫湜就各自成为一种倾向的代表。李翱作《复性书》，开宋代理学的先河；皇甫湜提倡“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¹的怪异风格，使散文创作走上生僻艰涩的道路。另一方面，在腐朽动乱的晚唐政局和纷争多变的五代社会里，干戈扰攘，战乱频仍，严重阻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偏据一隅的统治者，大多是不思振作、得过且过，拚命追求享受，沉湎于醉生梦死的生活；许多文

人囿于时风，也征歌逐舞，花酒颓唐。士气和文风互相影响，于是，能够和当日诗词中靡靡之音相配合的浮艳藻丽的文辞便应运复炽，而已经脱离实际的短局滞涩的古文也无力与之抗衡。尽管由于现实的阶级矛盾的推动，出现过鲁迅称之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²²的小品文，但就整个文坛看，却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歪风统治着。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的纷争局面。由于唐末农民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地主残余，促使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以租佃关系为特色的新的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如土地买卖、实物地租、契约关系等)普遍确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北宋统治者针对唐末五代的种种积弊，以加强中央集权、镇压农民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复辟为中心，在政治、军事、财政、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套新的措施。宋初的思想文化政策，如优待文人、优容隐士、优待诸国降臣、广立学校、扩大科举、扩大官额、提高文官地位和俸禄、儒释道并崇乃至大规模整理编纂典籍等等，都是服务于这个总方针的。而这些措施则在客观上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统一国家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由于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农业、手工业逐渐繁荣，社会经济逐步高涨起来。适应于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奢侈佚乐的生活需要，晚唐、五代轻靡文风固然被御用文人们继承着、倡导着。但另一方面，随着新王朝统治下阶级矛盾的逐步激化，一些了解实际、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为当前种种社会问题所推动，则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这样，就形成了宋初两种文风同时存在、对立发展的现象。

宋代第一个提倡写作韩柳式散文的是柳开。《应责》一

文，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提倡写“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的文道合一的观点。然而他总的倾向却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³ 他讲的道仍是韩愈《原道》之道，即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儒家之道，宣扬重道轻文，而他又缺乏韩、柳那样的生活实践，所以并未能做到“随言短长，应变作制”，而仍不免“辞涩言苦”。但他首先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反浮靡等观点，向当时的不良文风投以批判，对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影响。

与柳开同时倡导古文而创作颇有成就的是王禹偁。他出身清寒，入仕后遇事敢言，“八年三黜”，对现实的正视构成了他文学思想的进步基础。他也以宗经复古为旗帜，实际上取法韩、柳，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但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因此要“句易道，义易晓”，继承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作品如《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思想进步，语言平易，足以和其主张相符。

然而，依附于上层统治的绮靡文风，积重难返，并非一下扭转得过来的。恰恰在柳开、王禹偁相继去世之后，以杨亿、刘筠为首的一些人，噪聚馆阁，“雕章丽句”，“更迭唱和”，大煽浮艳之风。他们的诗，编为《西昆酬唱集》，与诗风一致的骈文，也号称“昆体”，广泛流播，在文坛上盛行三十多年。欧阳修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⁴，就揭露出了这种文章风行并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浮艳文词，可供粉饰和享乐之用，但不是加强封建政教的工具。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反对它的人愈来愈多。当西昆派的淫词艳曲唱到肆无忌惮之时，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下诏，指斥“近代以来，属词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⁵。到了仁宗时，范仲淹于天圣三年（一〇二五）提出的改革时弊的政纲中，也要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⁶。之后，宋仁宗于天圣七年（一〇二九）、明道二年（一〇三三）连续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⁷。从大中祥符迄至明道的二十余年间，朝廷的表态和文士的呼吁，互为因果，使得主张改革文风的人士接踵涌现，显示出了新古文运动准备期的活跃局面。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穆修、范仲淹、孙复、张景、宋祁、尹源、尹洙、石介、苏舜元、苏舜钦等。他们都沿着柳开、王禹偁提过的重道、致用、宗唐、崇散、反浮华以立论，在具体发挥和实践上则各有偏长。穆修校印韩、柳集亲自出售，声称“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⁸，颇有强调“文统”之意。范仲淹在理论上大声疾呼“救斯文之敝”，创作上体现出充实的政治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性。孙复强调“致用”，他认为的“明道”之文，除了“列圣人之微旨”外，还包括了“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等内容。石介则对“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的杨亿予以严厉的批判。上述诸人倡导古文，冒着“排诋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⁹的遭遇，“为于举世不为之时”¹⁰，精神是可嘉的。但是，他们在宗唐尊韩的同时，也把自李翱、皇甫湜而来的道学气、怪僻气继承下来，不少文章写得断散鄙拙、简陋粗涩，至有读而不能晓者。这样，就大大限

制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尽管如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他们仍不失为欧、苏之前宋代散文发展的一批有贡献的推动者。

二

领导新古文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为宋代散文奠定基础而能上继韩、柳的,是欧阳修。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从转变一代文章风气上讲,欧阳修的确堪称为宋代的韩愈。韩、欧都处在改革文风的关键地位上,即前有先驱者行动而未能成功,后有一大群响应者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领导运动取得胜利,决定于许多因素,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能否从实际出发,使文风的改革适应于自己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韩、欧二人实质上相同之点,就是各自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具备进步的政治历史见解,以“古文”为武器积极投身于当代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在写作实践中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刻苦研讨和精益求精的作风,这种种因素使欧阳修在理论和创作上高出于宋初诸人。

欧阳修从儿童时代起就倾慕韩愈,十多岁就立志学韩:“学者当至于是而止耳。”¹¹二十多岁时,与尹洙等补缀校定韩文。他的理论与宋初诸人一样是尊韩的,但是并非完全照搬韩愈,而是根据实际检验有所取舍。就“道”而言,趋向平实;就“文”而言,趋向平易;就文与道的关系而言,主张重道以充文。针对西昆派的雕琢,他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¹²。他之所谓道,仍然是孔孟儒家之道,但他不象韩愈和宋初人那样

强调“统”的传授，而强调从关心现实中得来。他认为许多人学道而不能至，就因为“弃百事不关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²¹³。他解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²¹⁴只要事信、载大、言文，就是明道之文。这样讲，平实而不玄虚。另一方面，他所谓的“不难”，并不是道学家侈谈的“有德者必有言”的“必有”。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举颜渊为例，说明所谓德行之士不一定必有文章表现。可见道能充实文，却不能代替文。这是柳开诸人未能见到的。循此前进，欧阳修又提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²¹⁵。就是说，文之表现道，方式、方法、风格是多样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万世遵循的模式存在，这就更与石介们那种认为有了孔子可以永远不出圣人，有了韩愈可以永远不生贤人的论调大异其趣了。

欧阳修从实践中感到那种只求“文章丽，言语工”的雕刻破碎之文，自应扫荡，就是从皇甫湜以来直到宋初人还因袭着的艰涩之文，也是不能适应需要的。因此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从现实的口语中提炼平易自然的语言以行文。他批判了樊绍述“穷荒搜幽入无有，一语诘曲百盘迂”²¹⁶的险怪，提倡写“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²¹⁷的文章。易知易明，就是苏轼称他的“其言简而明，信而通”²¹⁸，就是韩琦评他的“得之自然”²¹⁹，也就是他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的意见：“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²²⁰后来朱熹的评论也特别有见于此：“欧公文章……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

换却那寻常底字。”²¹ 欧阳修这个“易知易明”、从“自然”、“寻常”着眼的认识，是暗合于文学作品及一切书面语言的发展规律的。事实上，历史上能缩短文言与口语距离的成功的大作家如司马迁、韩愈，也是这么做的。就当时而言，欧阳修的这个认识和主张能否贯彻下去，确是关涉到宋代散文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这里，欧阳修表现出了“信道笃而自知明”的勇气。从他与宋祁同修《唐书》，戏书“宵寐匪祯，札闼洪麻”以嘲讽宋祁“涩体”的故事看，从他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知贡举时，坚决斥黜那些写怪僻文章的“知名之士”的故事²²看，他对这个问题是认识明确，态度坚定，毕生为之斗争的。

欧阳修实践自己的主张，勤奋创作。脍炙人口的“三上文章”的佳话，及他严肃刻苦修改文章的事实²³，说明他主张的平易自然，决非浅易粗率，而是“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对于他的文章的总风格，苏洵有一段精当的评论：

执事之文，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²⁴。

这种风格，贯注于他的所有文章体式中，导致了赋和骈文在他手上产生变化，随笔小品由此而日臻繁荣；融抒情、叙事、议论于一，注重虚词的运用等等技巧上的变新由此而渐多研讨。特别是他那种曲折情致和容与态度的自然结合、旺盛气势与平易措词的巧妙安排、富有逻辑力量的严密结构、一唱三叹的情韵以及精练的用词造句手法，对后代散文产生了很有益的影响。这种散文，更切近实用，宜于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可以说，由欧阳修完成的这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打通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所以，那个搞了大半辈子“涩体”的宋祁，最后也不能不服输，说：“余于为文

似蓬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非。”“每见旧所作文，憎之必欲烧弃。”²⁵他终于承认欧阳修走的是一条正路。

欧阳修理论上和创作上有巨大成就，加上他虚怀若谷，平易待人，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因此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人。同时的有二宋、二尹、三苏，晚些的有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他们形成一支有力的散文创作队伍，推动宋代散文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

曾巩的理论和创作最接近欧阳修。他把欧阳修“事信、载大、言文”的观点，发挥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²⁶，从史传文写的角度把道与识（明、智）、才（文）相提并论；在《寄欧阳舍人书》中又讲只有“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明道之文。这都给了“文”以较高的地位。在创作上，因为他缺少如欧阳修那样的生活实践，所以也就缺少欧阳修文章中那些激烈的政治内容，而是以“古雅”、“平正”见称，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而又委曲周详，布局完整谨严，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哲。因此其文在“八家”中是最便学习的。朱熹就善于仿效他，清代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也多由曾文入手，就是这个原因。

由欧阳修汲引而步上文坛的一代人中，除苏轼外，王安石独具特异风格，成就很高。

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王安石主张文贵致用：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

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²⁷。

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把文章看成工具，对这位政治改革家来说是很清楚的。他所谓“道”，是指施之实用的经世之学，比那些只在孔孟体系内打圈子的要通达些。说“有补于世”，也比空言明圣人之道，直截了当。所谓“适用”，指“文”要成为强有力的治教政令，为政治服务，这也是鲜明剴切的议论。但是，从艺术认识的历史来看，他的理论有两点错误。首先，是把“文”的作用狭隘地局限于治教政令的直接应用范围内。如果说，道学家要人把文章都写成哲学讲义；王安石就倾向于要使文章都成为文件布告。其二，是以器为喻所导致的形而上学的引申。“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这一讲，实际上否定了“文”（指文章艺术性）的巨大功能。真理过头一步即是谬误，何况王安石的理论本身就有缺点。所以，由于他的政治影响而使这个理论实行之时，即出现了很大的副作用。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指出：“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王安石本人的文章是好的，其理论总的方面也是好的，但因为绝对化地“好使人同己”，订下些死框框，结果造成了单一化、雷同化的“场屋诡伪劫剥穿凿猥冗之文”²⁸的大肆泛滥。虽然王安石没有多少直接责任，但作为历

史教训是深刻的。

王安石的散文在宋代不失为第一流的作品。韩愈曾讲“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定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其他叙事抒情之作，亦颇能随笔挥洒，曲尽其妙，表现出驾驭语言的卓越的能力。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理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苏轼是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他对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散文发展的弊病看得很清楚。他说宋初诸人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但是“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致造成“余风未殄，新弊复作”²⁹。基于这种认识，就要同时向浮艳和艰涩两种倾向进行斗争，这就不能不走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路子，就不能不在散文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作新的探索与开拓。苏轼终身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长期用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散文参加思想论争，又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和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因而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赋予的任务。

在北宋中期的具体环境中，苏轼散文创作的特点是突出地重视“文”。他鄙视那种“程式文字，千人一律”³⁰，而认为好文章“如金玉珠贝”³¹，“如精金美玉”³²。因此，他论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他说：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³³。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³⁴。

这两段文字，从创作的全过程着眼，把苏轼心目中的“道”、“文”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讲得很清楚透辟。他这里所说的“理”、“妙”就是“要言妙道”的“道”。他讲的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的“物固有是理”的理。他曾说：“日与水居，十五而得其道。”³⁵又说：“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斲轮，庖丁解牛，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³⁶所以，他说的学道，就是求“通万物之理”³⁷，这样来理解道，近于《韩非子·解老》所谓的“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由此出发，他结合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讲“文”：第一阶段，是“求物之妙”、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如学游泳之“日与水居”，学画竹之“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³⁸。第二阶段，是对物象物理“了然于心”，即“得成竹于胸中”³⁹的阶段。这个“成竹”，当然不是对自然竹的简单表象，而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这一点，在苏轼以前的宋人中没有人讲到过。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将头脑中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为文章。这三个阶段都要毫无缺憾地完成才是苏轼所说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⁴⁰的“文”。这样来谈文，也是此前宋人中没有一个能窥见的。苏轼对“文”所悬的标准甚高，正是反对浮艳与

艰涩两条战线作战的需要。因此,他还就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辞达”的问题从三方面加以剖析申说。第一,“了然于心”的人,不见得能“了然于口”,因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是不成立的,只有“德之发于口者也”⁴¹。而要能发之于口,必须下功夫钻研学习:“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⁴²这就明确提出,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解决“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的矛盾。第二,怎样才算“了然”,了然的标准就是“随物赋形”⁴³。客观的物象物理能具体呈现于胸中,才算“了然于心”;胸中之物象物理能准确地表现在文中,才算了然于口与手。第三,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推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的过程,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⁴⁴。对于这个创作中的兴会问题,苏轼曾以画家孙知微在成都大慈寺作壁画时的创作状态⁴⁵为例,予以形象的表现。又曾将其父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中风水“相激成文”的观点括为一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⁴⁶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创作过程中主体的修养和客体的感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了。论文而不局限于儒家之道,求“物固有是理”而了然于心,再到充满勃郁之后而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这样的创作境界是那些空言载道及“以艰深文浅陋”者流无法体会的。

苏轼创作包罗宏富,正是他上述理论的绝好证明。他一生于散文用力勤,作品数量大,体裁多。由于他积极从政,洞悉历史,为人正直,品德优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敢于直说自己的意见,故其政论和史论大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地说理,明显地继

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苏轼行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而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为所迂，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身行事，勤于政事、肯定人生、积极乐观、胸次广阔。因而，他的其他样式的散文，如书信、记、序跋、随笔等等，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笔酣墨畅，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确如他自己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⁴⁷。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⁴⁸总之，苏轼散文吸取了前代传统的重要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均以散文著称。苏洵文字雄奇坚劲，议政议军，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苏辙文章不如乃兄才华横溢，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⁴⁹，在宋代散文中也是能够独自树立的。

宋代古文运动，至苏轼而告胜利完成。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比较注意奖引后进，为青年人开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廌等，都是北宋后期文坛知名之士。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深受苏轼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也都是沿着欧、苏的道路前进的。

三

自宋仁宗庆历年间到宋哲宗元祐末期的五十年（十一世